

西方的中國醫學史研究：成就、方法及展望

文樹德 (Paul U. Unschuld) 著
德國慕尼黑大學醫學史研究所
麥勁生譯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撮要

本文紀錄七十年代以來部份有關中國醫藥衛生歷史的著作，並探源近年中國醫學史的快速發展。在過去三十年，有關的學者人數正慢慢增加。他們已發現中國醫藥衛生科學的歷史及其社會文化條件是極有研究價值的課題。因此，在這段期間出版了相當數量的相關專題研究、概論式的著作、少量的原文翻譯及愈趨可靠及有用的研究工具書。此外，用作研究中國醫藥衛生科學的歷史材料，亦從醫學文獻擴展至小說、歷史專著、官方記載及其他出版物，以至手稿、藝術品及行醫製藥的各種器物。儘管如此，醫學史在中國研究中，尚未成為一個專門的學科。

一、引言

在整個二十世紀，西方的中國研究一直未能系統和持續地探研中國人的健康與疾病理念的發展，以及治療與醫學的社會制度。這種現象值得大家留意，因為一個文明對抗疾病及死亡的經歷，比其他方面更能反映該文明的內涵。

健康科學匯合了哲學與宗教、倫理與禮儀、科學與天文學、占星學與數學、植物學與科學、經濟因素與社會結構、語言與符號、科技與個人經驗，本土傳統與外來影響，及更多的其他因素。因此，我們與其孤立地研究以上諸題，不如將健康科學作為了解一個文化精神特質的出發點。

西方的中國研究情況卻非如此。到今天，沒有一間研究所或者一個大學教席是專門為研究中國健康科學的歷史與現況而設的。從前極少有學者專注於這些研究，今天亦一樣。只有少數學者闖入這領域，但他們大多不敢寄望能建立一番事業。

儘管如此，在過去二十年左右，西方的中國醫學史研究已有顯著的進步。一個剛進入該領域的學生，比較過去二、三十年前的前輩，要讀更多材料才能掌握該學科的研究概況。和1960或者1970年代我們剛開始研究時不一樣，今天大家對很多中國醫學史的基本知識和特性已經耳熟能詳，學界新手需要深入查證或否定的理論和假設已經不多。

健康科學的歷史研究大致可分成兩類：第一種專注於有關健康和疾病知識的發展，另一種是關於這些知識產生和應用的文化環境。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它們被冠以內史（internal history of medicine）及外史（external history of medicine）的名稱。這種分類的確十分有用，可使學生在廣泛研究領域中，得知何處才是其興趣所在。

不過，任何內史研究早晚亦會涉及外史，外史亦不能獨立於內史之外。我們研究周朝末年及漢代的經脈理論和血、氣流行說的起源時，不能不參考戰國末年及秦漢諸代的政治動態。同樣，我們要探討古代中國醫學的特性，就不可能無視道家與藥物學、儒家／法家與醫學的系統相關性。還可以列舉更多的例證來說明，內史必須依賴外史的研究成果，反者亦然。

以下我將專注於幾位歐洲學者，以求道出一些二十世紀首七十五年，可以反映西方對中國醫學史認識的重要課題和研究進展。中國醫學史的研究方法在1970年代中期以後有重大改變。歐洲及美國的學者愈來愈覺得中國醫學史並不是滿足個別人對異國文化好奇心的遊樂場，而是一個真正值得珍視的研究領域。與此同時，歐美學者和東亞的同儕緊密聯絡，也使他們醒覺到，假若能為中國醫學史研究注入新能量，甚至可裨益跨文化研究。因為今天大量的東亞人在歐美居住，並為當地的繁榮福祉作出貢獻，而歐洲文化亦持續影響東亞經濟及社會，所以大家須致力去掌握這兩個傳統的異同。跨文化研究會有助於整合未來的世界。

研究中國醫學史及比較中國與歐洲醫學史的目的，當然是為了尋求科學知識和發掘更多有趣的資料。科學、醫學哲學和醫學社會學，及其他更多的科目，都受益於中國及歐洲的學術思潮。中國文化建基於儒家、法家及道家的世界觀，而歐洲文明的世界觀則反映於不同派別的基督教義之中。我們關心的很多問題，諸如人類如何建立他們的生存環境，並且從一片混沌中創造秩序等等，只能在不同的世界觀對照下，方能清晰地提出和解答。

然而，研究中國醫學史及比較中、歐醫學傳統的一個愈趨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為各種傳統的交流和互動，建立一個更穩實的基礎。不管是西方學者要創造一個真正的「傳統中國醫學」的宏願，還是要建立一個全球性的醫療倫理的要求，都須借助比較中、歐醫學史所提供的資料方能達成。只有事實和數據，而非臆測才能支持有關的討論，以及這些宏願和要求所必需的政治、專業及經濟方面的決定性因素。

二、緣起

在1960年代，當我對中國醫學的今昔發生興趣時，慕尼克的各大圖書館僅有幾本由德國及其他地區學者寫成的作品，當中最出色的，是胡博特（Franz Hübotter）於1929年在萊比錫出版的《二十世紀初的中國醫學及其發展歷程》（*Die Chinesische Medizin zu Beginn des XX. Jahrhunderts und ihr historischer Entwicklungsgang*）。[\[1\]](#)

早在1913年即已出版《中國和西藏及蒙古藥物學研究》（*Beiträge zur Kenntnis der chinesischen sowie der tiberisch-mongolischer Pharmakologie*），[\[2\]](#)「古代中國名醫師」（*Berühmte chinesischen Aerzte des Altertums*）[\[3\]](#)及「壽世編：中國古代的接生術」（*Shou-shi-pien: ein Chinesisches Lehrbuch der Geburtshilfe*），[\[4\]](#)並且在1924年以英文發表《中國古代醫學研究者及醫學著作簡錄》的胡博特，[\[5\]](#)比起一百年後的一些同業更能掌握他的研究課題。胡博特不僅是個醫生，更曾研讀哲學，中文、土耳其文及波斯文。他師承幾位出類拔萃的歐洲學人，如沙宛（Eduard Chavannes），顧路柏（Wilhelm Grube）及孔好古（August Conrady）。當他在中國湖南省益陽（Yiyang）的一所挪威醫院工作時，他寫成了《二十世紀初的中國醫學》一書。精通英文及法文，亦能閱讀拉丁文的胡博特，不但細讀了他所研究的中國文獻，亦參考過大量有關中國醫學的歐洲文獻。

胡博特自知是這領域的先鋒。第一所設於大學的醫學史研究所，於1907年由蘇特荷夫（Karl Sudhoff）在萊比錫（Leipzig）創立。當普遍的醫學史家還只專注於歐洲的狀況時，胡博特開始對中國的有關問題產生興趣。當時的醫學史針對的問題和今天的不同。胡博特知道二千多年來，

中國的醫學典籍累積了非常豐富的醫學史知識。同時，他不能想像中國醫學如何在二十世紀抗衡以科學為基礎的西方醫學。對他來說，中國醫學史快要走到它的盡頭。當時的急務，是要重整史實，並且比較中國與西方的見解及醫療保健方法。他深信歐洲的科學會給予歐洲醫學一種傳統中國醫學不能對抗的優勢。

王吉民（K. Chiming Wong）及伍連德（Wu Lien-Teh）所著的《中國醫學史》參照了胡博特的看法。[\[6\]](#) 這兩位曾在東三省防疫處工作的醫生，在他們的作品中提供了大量有助後來研究及討論的資料。然而，書中引言重申了胡博特的觀點。他們兩位都不能擺脫他們的時代的精神。他們強調：「中國醫學史不能只專注於歷史悠久的本土理論及實踐，更須兼及在上一個世紀有非凡進步的現代醫學的成就。中國醫學的知識及重要性需要整體評估。它根植於四千多年的經驗，但若真的要作出重大貢獻，它必須借助近代醫學的觀察、實驗及調整等等重要原則，否則不可能有進步。」[\[7\]](#)

在這兩位醫生的觀點中表現的科學偏見一直至二十世紀下半葉仍影響醫學史研究。當胡伯特、王吉民及伍連德進行他們的研究時，那些從醫療人類學、社會學、文獻研究等等學科衍生出來，而且今天被視為不可缺少的方法，仍然鮮有人認識，或者僅僅開始被應用在研究中。五十年之後，一個真正的質變也清楚顯現。

這不是說這個時期沒有任何作家嘗試從人文科學的角度去探討中國醫學史。也許第一個為中國醫學史費盡心力的德國漢學家應是哈爾特拿（Willy Hartner）。[\[8\]](#) 他的視野比胡伯特寬廣。他專注於療法（Heilkunde），而並非醫學（Medizin），所以他的歷史著作中有不少被胡伯特視為迷信或者與醫療無關的中國古代醫療倫理。哈爾特拿使用的中文材料遠較胡博特的多。他也能論及中國傳統的醫學倫理，並且揭示了與歐洲大相逕庭的中國醫療保健組織。

在哈爾特拿之後，出身藥物學，並且在萊比錫的卡爾·馬克思大學（Karl Marx University）東亞研究所受到著名漢學家艾爾克斯（Eduard Erkes）教導的施讓姆（Gottfried Schramm），集中研究中國醫學的語詞，並且出版了第一部關於中醫語詞的析論。[\[9\]](#) 他指出了認識中國醫學語言歷史的重要性，因為它讓讀者正確地解讀醫學以至非醫學文獻中的醫學用語。施讓姆是最早指出一個存在數十載的錯誤做法的其中一人：這錯誤在於以現代醫學概念去理解古代中國的醫學用語，並且強行翻譯。這種做法將醫學用語抽離原有背景，並且扭曲了它們從前包含的內涵。

因為他的藥物學背景，施讓姆很自然地與他的伙伴摩斯格（Alfred Mosig）閱讀了《本草綱目》這本最重要的中國藥物學匯編。[\[10\]](#) 幾十年後，歐洲的漢學家也覺得需要多花點時間鑽研這作品。

在施讓姆及摩斯格的時代，法國兩個醫學史家，胡雅爾特（Pierre Huard）及他的中國籍同伴王明（Ming Wong），準備撰寫《幾個世紀以來的中國醫學》（La Médecine Chinoise au Cours des Siècles）。[\[11\]](#) 法國的研究條件是獨特的。它擁有印支半島殖民地，因此比任何一個歐洲國家更能與東亞及東南亞維持密切的聯繫。就算是佔據香港的英國也比不上它，因為香港一地的中醫事業不比法屬印支旺盛。因為中國醫師源源不絕由印支半島湧入法國，也因為大量法國學者，如雷格魯爾（J. Regnault）、沙爾符（Chamfrault），尤其是摩倫（Georges Soulié de Morant）在二十世紀初的努力，法國是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初最盛行針灸的歐洲國家。所以，法國醫師對胡雅爾特和王明發表的中國醫學史觀點並不感到陌生。但在其他國家，例如在1919年失去了所用東亞殖民地，並且無緣繼續與東亞各國交流的德國，情況就不盡相同。

無論如何，胡雅爾特及王明都強烈指出從宋代開始，中國醫學因為斷絕了和非中國文化的交流，所以失去了經驗的基礎。如同整個中國文化一樣，中國醫學進入了冬眠的狀態。直至十九世

紀末，中國醫學的代表人物才開始重新欣賞這門學科的古典成就，並且將之與西方醫學並用於醫療之中。[\[12\]](#)

1970年，身兼醫生和漢堡大學（University of Hamburg）中國研究教授兩職的拿爾（Jutta Rall），出版了一部著作。它可算是中國醫學史變為人文學科之前，其中最後一本以純醫學角度寫成的作品。[\[13\]](#) 拿爾從西方醫學的角度審視金、元時代兩位重要醫師對中國醫學的貢獻，並且斷定那些醫師的發見在六至七個世紀後仍被肯定。不過拿爾的作品並沒有觸及一些後來的研究者較感興趣的問題。

不久之後，受過藥物學及中國研究訓練的文淑德（Ulrike Unschuld）撰寫關於十四世紀《湯液本草》的作者王好古的博士論文時，已將研究重點轉到另一個方向。[\[14\]](#) 她的作品看似純粹關於中國醫學內部發展的研究——只集中於五德終始和陰陽學說和藥物的關係，但實際上，她將這些問題置於一個更大的社會及哲學背景中。簡單說，她在同時期的中國社會及哲學環境中，找尋驅動同時期中國醫學的概念變化的因素。

三、通論作品

先回到我在本文之首提到的問題，就是當我因緣際遇，開始專注於中國醫學和藥物歷史的時候，西方的中國醫學史研究概況。在當時，胡博特、拿爾、施讓姆、胡雅爾特及王明的作品是可供參閱的最重要二手材料。除此以外，我沒法尋到一本由中國學者寫成的作品。即使有，它們大概只能提供一些不同的資料，但卻沒有不同的觀點。

直到1970年前後，也沒有任何可協助快速及準確查證中國醫學名詞的專用字典。魏迺傑（Nigel Wiseman）在上世紀末出版的佳作，實能介紹統一及準確的古代醫學術語用法，但這書畢竟是二十五年後的作品。[\[15\]](#) 同樣地，一套以歐陸文字出版的古代醫學經典完整匯編始終久奉。對個別中國醫學史的專題，如醫學道德及其他相關科目的初步研究亦嚴重缺乏。

我和我的太太文淑德，在缺乏和德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同道的聯繫下，開始逕自開闢研究之路。到今天，我們的研究，在那時候其實和今天一樣，仍然引起不少人談論，有時甚至是仇視。就在一九七〇年代，美國總統尼克遜（Richard Nixon）訪華之後，中國醫學先而被西方傳媒「發現」，繼而被那些對西方醫學感到失望，並且視中國醫學為潛力無窮的新出路的西方醫療人員及病人所重視。1976年，當我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來的一個演講中，大膽質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鼓吹的中國共產式的醫療制度和赤腳醫生時，一群狂熱群眾的叫罵聲壓倒了我。我努力嚴正地分析中國醫學及藥物學歷史的企圖，似乎困擾了那些認為中國醫學能西方醫學所不能的群眾。在這氣氛中，我的博士論文的英譯本《當代台灣的傳統中國醫療：以藥物學為中心》（*The Practic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Health Care System in Contemporary Taiw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harmaceuticals*）無緣在美國出版。[\[16\]](#) 一間出版社的總監引用一個評論者的報告說，我的作品對中國醫學有太負面的評價。其實，我的書只是報導了我在1969至1970年，留台期間所見所聞。縱使如此，我很高興見到在二十五年之後，我從前期盼在這研究領域中發展的，都已真正發展起來了。但是，好像在西方那種可以誘使更多學生及知名學者全情投入研究的制度，今天還是缺乏的。

我的作品並不完整，價值也很短暫。它並非一個有系統的研究，而是我對幾個偶然遇到的問題的反思。基本上，我的研究的內容可分為四項：概論中國醫學和藥物學發展趨勢，翻譯一些富啟發性的中國醫學文獻，深入研究中國醫學及藥物學的個別專題和發表有助本科學生學習的教科書及語言導引。

藉著我們在藥物學的背景，1969年我和我的太太在台北接觸到那琦博士。我們從他那?認識到日本本草學專家岡西為人（Okanishi Tameto）。幾年之後，我有緣遇到岡西為人博士。那琦博士的教導和岡西為人的早年作品，誘發我利用漢代至清代的醫學史料去撰寫一本中國藥物文獻史。在後來的英文版本中，我加入了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官方藥典。<!--[if !supportFootnotes]-->[17]<!--[endif]-->

就現存文獻而言，藥物學並非中國傳統醫學的最大領域。因為我的能力所限，而可供我研讀的中、日學者的作品又不多，所以我只能專注於《本草》的研究，而略去了大量其他的醫療典籍，包括方書。<!--[if !supportFootnotes]-->[18]<!--[endif]--> 縱使如此，我對二千多年來有關《本草》文獻的概述，是第一部讓西方讀者認識到這門中醫學問至今的發展歷程的作品。除了讓西方讀者看到大量從前只有通曉中、日文的人士才能看到的資料外，該書傳遞了另外一個重要訊息。不少鼓吹援中醫入西醫的西方作者，都認為理念及實踐經驗兼備的中國醫學，早在二千年前已發展為一個成熟完整的系統。千百年的臨床經驗正好證明東方的醫學見解和療法，比一百年前的西方醫學有更卓越的成就。

這種非歷史的觀點當然經不起歷史研究的檢驗。所以，有必要對本草文獻的發展及當中蘊藏的知識作出綜述，以求詳細說明，中國醫學發展的歷史遠較1970及1980年代的學者所建構的複雜多變。這綜述的最後一個影響，就如其他的導論一樣，表面地觸及了一些作品，卻引發相關的深入研究。我的作品所引述的百多部本草學作品，幾乎每一部得都值深入研究。李時珍於十六世紀寫成，但至今天才被西方漢學家留意到的《本草綱目》，就尤其值得研究。這並不是說以前沒有關於《本草綱目》的研究。著名的漢學及民族植物學家馬蒂爾（Georges Metaile），就曾對多個與《本草綱目》有關的課題進行研究。<!--[if !supportFootnotes]-->[19]<!--[endif]--> 當然，我們希望西方漢學家認識到潛藏於李時珍的自然歷史及藥物大百科中的無盡內涵。長遠來看，我們亦希望西方學者如同東亞學者一樣重視這個人類文明的重大財富。

最近，魯桂珍(Lu Gweidjen)的紀念文集展示了大量在物質治療理領內的有趣課題，好像安格爾赫特（Ute Engelhard）的論文「唐代的食療及首部食療著作」“Dietetics in Tang China and the First Extant Works of Materia Dietatetica” <!--[if !supportFootnotes]-->[20]<!--[endif]--> 及奧賓爾亞（Frédéric Obringer）的研究「藥物學的新改進：關於砒霜及砒霜花的應用」（An Innovation in Pharmacotherapy: Some Remarks on the Use of White Arsenic and Flowers of Arsenic）。<!--[if !supportFootnotes]-->[21]<!--[endif]-->

我的第二部概論作品專注於中國的醫學倫理。<!--[if !supportFootnotes]-->[22]<!--[endif]--> 我嘗試從一個社會學角度去觀察二千多年來的醫師的執業經歷。其實不少的有關問題，諸如醫師的社會地位，在指定時期專業化的程度，世界觀及宗教義理對醫療的影響及中國與歐洲的醫療道德的異同等等，一直沒有被提出。這些問題的答案可幫助我們了解特定的社會及經濟環境和專業政策怎樣影響醫師的地位。同時，中國醫學倫理的研究提供一個寶貴的機會，讓我們在一個異域文化處境中，去檢證舒拿（Max Schelers）所說的「明確」（explicit）及「隱含」（implicit）倫理的有效性。

就如我的本草研究一樣，這本關於中國醫學倫理的小書，因為未能精確分析幾本中國典籍，所以只能視為詳盡研究中國生物及醫學倫理歷史的起點。在全球化的年代，在大家共同關注醫學及科技對人體的干預的年代，不但東亞的人們要了解那些在西方醫療傳統發展出來的價值及態度，西方人亦同樣要認識在東方傳統產生的價值和態度。只有在這互相理解的基礎之上，有價值的討論及對話方能進行，誤解才能避免。

近年，我在鄭金生教授協助下，研究過一本看似是江湖郎中手冊的作品。在書中，佚名的作者講述他如何宣傳自己的醫技，如何招徠及說服顧客接受他的意見，並且使他們付出診金。<!--[if !supportFootnotes]-->[23]<!--[endif]--> 這本手冊是私人手稿，其中的分析顯示出一個刊行文

獻沒有表露的世界。很明顯，單靠刊行文獻去研究中國醫療倫理，我們難以真正了解病人與醫者的真實關係。當然，刊行作品指出了社會衝突及結構，是有待我們從多方面研究的寶貴資料。

我們要留意迪柏（Catherine Despeux）和奧賓爾亞，聯同馬斯（Miéko Macé）、美亞（Fernand Meyer）及瓦里（Elisabeth Rochat de la Vallée）寫成的綜合論述《中古中國疾病》（*Disease in Medieval China*）。該書集中研究漢至宋的咳嗽療法。^[24]作者明確地指出「中國疾病分類學是尚未開墾的園地」。^[25]現時供西方的中醫學生閱讀的書本，一般對中國傳統醫學及疾病分類得過簡，但這無礙漢學家學習並且顯示中國疾病分類學的本來面目及多元性。基本上，研習者並不需要現代醫學知識基礎。像我較早前的一篇利用中國傳統的天人相應學說去解釋麻瘋病的文章，大抵只借助漢學知識。而關於麻瘋的知識可以從其他有關文獻中得到。^[26]但是，不容否認的是——尤其在我和眼科專家柯友耕（Jürgen Kovacs）合作研究中古中國眼疾概念後，我尤其覺得一些特別課題需要涉及醫療和漢學知識。^[27]

在這?最後要談及的概論作品是我的《中國醫學觀念史》（*Medicine in China: A History of Ideas*）。^[28]受到我太太研究宋、金、元醫學和新儒家思想的關係的啟迪，我開始研究整個中國醫學思想的歷史，並將之聯繫到帝制時代中國的社會哲學和社會政治結構的重要轉變及發展。這個研究的顯著成果使我建立了全新的假設，最近這假設已變成以下的論說：導至醫療思想系統興替，或者是醫療思想系統內在變化的主要動力，是醫學以外的因素，而不是臨床觀察和實驗累積而來的識見。臨床實驗的結果只是用作檢證那些看似可以初步接受的理論。而這些看似可信的理論都是建基於社會秩序和危機，與身體健康和失調的類比之上。

同時，《中國醫學觀念史》亦有助於詮釋歐洲醫學史。不過，自這書出版近二十年以來，我們對中國醫學史的認識已大有進展，而該書的偏見亦變得很明顯。當我撰寫該書時，我全神貫注於功能一系統理論（functional-systematic approach）在中國醫學史的角色。當時我並沒有留意到實體理論（ontic approach）。雖然實體理論和功能一系統理論在中國醫學史上同樣重要，但實體理論被那些供行醫者參考的文獻所徹底忽視。原因可能是，這些文獻的作者只想表達他們認為西方醫學缺乏的東西，他們因而略去了中、西醫互通的部份。漢學的一個重大任務，就是要修正這些偏見，並且引領西方讀者進入中國傳統醫學思想的寶庫。

四、編輯與翻譯

將所有中國醫學文獻譯成西方語文的一大原因，就是為了要打開通向中國醫學知識的通道。以往我申請經費進行翻譯計劃時，一再有人質疑為何要將這些作品全數翻譯。無論如何，要做好一本註解《黃帝內經素問》英譯本需要大筆經費。現在，這個十年前定下的計劃已接近完成，但有人仍會問這是否有價值。

二十年前，根本沒有一本歐洲語的中國古代醫學作品可用，1979年當我開始翻譯《難經》時，^[29]我以為這部被晚清及二十世紀所有中文材料引用的作品，是《黃帝內經》的點評。我的假設是，在鑽研《黃帝內經》之前，我必須專注於前人對《難經》的評述。今天我知道這個假設是錯的。《難經》並非《黃帝內經》的點評。事實上，在與田和曼（Hermann Tessenow）及鄭金生聯手翻譯及分析這兩部作品之後，我懷疑《難經》可能成書於《黃帝內經》之後。《難經》的成書時期可能和《黃帝內經》的《素問》的一些部份相同甚至更早。《素問》和《靈樞》都被公認是成卷於公元一至三世紀的同期。它們都取材於同樣的作品，但這些作品在之後幾世紀陸續散失。

無可否認《素問》及《靈樞》都借助大量不同以至互相矛盾的材料，但《難經》卻是一部獨立完整的作品。這即是說，《素問》及後來的《靈樞》只是整輯而成，而且是並不完整的作品。整輯它們的人，在第一至第三世紀之間就部份章篇加插了黃帝和他的大臣之間的對話，但在其他部份卻沒有這種增添。整輯者也沒有刪去混淆的地方和概念上不銜接之處，縱然他們大抵和今天的讀者一樣察覺到這些問題的存在。相反，《難經》的八十一章首尾呼應。它沒有顯著的內在矛盾，亦似是由一個作者，利用《素問》及《靈樞》二書同樣引用過的資料寫成。明顯地，《難經》的作者從一些《素問》沒有記載的診斷及療法中得到獨有的見解，但這不代表《難經》較《素問》遲問世。

在這段期間，除了《黃帝內經·靈樞》外，所有在公元前二世紀至公元三世紀寫成或輯要的重要中國醫學文獻都被譯成英文。夏爾柏（Donald Harper）出版了馬王堆文稿中的整個醫學部份的翻譯及分析，為研究中國醫學提供了極為簡捷的門徑。[\[30\]](#)米切爾（Craig Mitchell）、馮擘（Féng Yé）及魏迺傑則新近出版了《傷寒論》（約公元200年）的譯本，方便大家認識這時代早期的最後一本著作。[\[31\]](#)

加上伊莉莎伯·許（Elisabeth Hsu）對於《史記》列傳105：「扁鵲倉公列傳」的翻譯和分析，及即將出版的英譯《黃帝內經素問》，兩漢時期將會是中國醫學史中受到最全面研究的部份。這應該是近代漢學的一大成就。回到先前的問題：這些工作是否值得？答案是肯定的。不懂中文的西方學者快將能夠閱讀到大部份中國中代的醫學典籍，也能自行評價古代中國醫學的內容和性質。他們不須再依賴那些早經過濾和滿載不準確的資料的西方文獻。更重要的是，他們現在有一個極大的資料庫，可用作比較研究中國、亞洲及印度的醫學發展，這種廣大的視野將有極深遠的影響。

總的來說，漢學有兩大使命。第一，為其他不懂中文的文科學者提供準確的資料，使他們能進行比較研究。其次，給予有志於應用中國醫學於臨床實驗的人士各種材料，使他們公平地比較東亞與西方醫學傳統。在第一項工作上有卓越成就的是布爾（Paul Buell）及安達臣（Eugene N. Anderson），他們曾註譯忽思慧在1330年著的《飲膳正要》。[\[32\]](#)此書不但是元代宮廷營養師記載元代宮廷膳食的優秀著作，更是中世紀歐亞文化史不少專題的重要材料。研究「新歷史」的人會特別覺得有用。正是因為大家逐漸醒悟到研究古代社會與文化不可僅僅看重政治事件，或某些時代的重大成就，新歷史才得以發展。歷史家需考慮更多看似平常無奇，但實際上同樣重要的歷史事件。[\[33\]](#)

在布爾及安達臣撰寫他們的作品之前就累積起來的大量資料，可以刺激漢學家去進行不同層次的研究。可幸倫敦韋爾金醫學史研究所（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in London）贊助的《韋爾金亞洲醫學叢書》（Wellcome Asian Series of Medical Monographs）給予高水準的研究一個發表的場地。這套叢書的首兩部作品，夏爾柏的馬王堆手稿研究及布爾及安達臣的《飲膳正要》譯本正為西方的中國醫療歷史文獻研究定下了標準。

我應該在這?介紹一下麥禮（Brian E. McKnight）註譯宋慈（1186-1249）的法醫作品《洗冤集錄》，因為它代表了中國文明的一個里程碑。[\[34\]](#)所有的文明都重視公義，找尋死亡的原因和追查非法害人致死的兇手。中國較其他文明更早發展出精確的方法，幫助法醫及官員去達到公平及正確的判決。對今天的漢學家及比較研究者而言，不少從中引伸出來的問題都是值得留意的。

1969年當我第一次到台北時，我在南京路買的第一本書是徐大椿（1693-1771）的《醫學源流論》。當時我不瞭解此書及其作者，但合該有事，印在此書背後的書名吸引了我。當時我文言文水準及中國醫學基礎均有限，只能看懂每頁的幾句。這本書長時期被我束之高閣，直至1980年代我想起它那小章篇的結構，我再次翻閱，試圖找尋一些可助我撰寫一本中國醫學史的教科書

的材料。[\[35\]](#) 當我重新閱讀徐大椿的作品時，我馬上被這個中國儒醫的智慧、見識和幽默感吸引。我察覺到徐大椿和歐洲偉大的生物形態學家摩爾加尼（Giovanni Morgagni）於同年去世。我也發現徐大椿的作品中有一篇「腹內癰論」。我覺得把《醫學源流論》譯成英文是一個有趣的研究計劃。這樣可讓讀者自行判斷徐大椿和摩爾加尼共通和相異之處。

我也曾希望《醫學源流論》的英譯，可以鼓勵其他人更全面地研究該書作者的生平及其他作品。[\[36\]](#) 我們對中國醫學史上個別的醫師和學者知得太少了。我們頗認識歐洲醫學史上的要人物，但對中國的醫師和學者卻僅識之無。對徐大椿的研究正是個叫一個古代醫師兼學者重生的機會。他留下的大量文獻不僅和醫療有關，不少更涉及哲學以至灌溉，足夠我們全面地認識他。

這?簡單陳述漢學中的醫療文獻研究的成果及潛力，證明了漢學所能作出的貢獻，我想強調這種工作是在中醫學研究中的獨特領域，比起其他主題，這更能容許漢學突破它的框框。1986年我在慕尼黑主辦的會議，給予從事中國醫學文獻翻譯的同業一個寶貴的交流機會。[\[37\]](#) 在這段期間，在統一中醫術語的英譯方面，進展尤其顯著。上面提及魏迺傑的字典，可以作為在這方面發展情況的最佳指標。

五、材 料

在此後幾年，新近進入這領域的年青學者大幅地加了研究課題。紀念魯桂珍的文集介紹了現時不同研究方向。簡單說，累積了二千多年的中國醫療文獻，可供研究之處不會比歐洲醫學文獻少。但因為專攻後者的研究所及人員遠較前者為多，所以我們對這兩個傳統的認識，在未來一段時間，仍會有相當差距。無論如何，我們仍須盡力指出中國醫學文獻的豐富內容和它們提供的研究機會。醫學和藥學文獻對內緣及外緣醫學研究同樣有用。醫師的著作及供醫師參考的作品不但藏有關於醫學概念、知識及實用療法等內在發展的資料，不少同時指出古代中國衛生發展的社會條件。

不僅這類型的文獻值得我們研究。好像伊達瑪（Wilt Idema）[\[38\]](#) 及較近期古倫（Christopher Cullen）及柏格（Daria Berg）都展示非醫學文獻諸如小說，在研究中國醫學史的作用。[\[39\]](#) 我們從這些非醫學文獻，得以知悉一些醫學文獻不會記載的資料，好像醫師的社會地位。基本上，任何與醫療有關的中文材料都可以作研究之用。[\[40\]](#) 就如針對胡亂行醫的法例及判例，可以是研究中國醫療倫理及醫師社會地位的重要材料。[\[41\]](#)

另外，在尚未印行的材料中尚有不少珍貴的材料。[\[42\]](#) 首先，在中國醫學史研究，手稿的重要性直至今天仍然大大被低估。因為中國的印刷技術早就問世，我們不必驚奇手稿研究在中國遠沒有像在歐洲醫療研究中般受到重視。所以，縱使馬王堆手稿、敦煌文獻，及其他材料近年頗引起關注，但是漢學界似乎對十九至二十世紀的醫療文獻少有研究。不過，初步觀察柏林民俗學博物館（Museum of Ethnology in Berlin）的大量中國醫療文獻所得，這些材料的重要性尚未被人發現。[\[43\]](#) 這些材料原本只供私人或者少數人傳閱之用，並非預算廣泛印行。它們紀錄了一般印行材料並未收錄的知識、療法及倫理。上面提及的醫師手冊只是其中一個例子，[\[44\]](#) 更多更多的材料有待進一步探討。

其次，歐洲與美國的醫學博物館一直都有從事收集與醫學有關的藝術品及器物，但利用這些材料作為醫學史料是最近的事。這情況在中國醫學史研究亦一樣。幾所有關博物館業已成立，但內藏的展品並未引起應有的關注。就如文稿一樣，這些器物藏有印行文獻沒有的重要資料。據我

所知，印行的資料從未收錄宋代以來，有關走方郎中推銷成藥的策略的資料。我們能從這些成藥盛器中認識到傳統中國藥學的另一方面，這可能與陳套的藥物典故大相逕庭。與此同時，這些器物證明了中國古代醫療經濟學的發展，並可以和現代的藥物工業作比較。 <!--[if !supportFootnotes]-->[45]<!--[endif]-->

另一個例子就是醫師和藥劑師印製廣告所用的本刻印模。在已印行的文獻中，我們找不到任何醫師自誇能耐的材料。但從這些印模印出的單張，我們得以了解中國醫學史的另一個面貌。 <!--[if !supportFootnotes]-->[46]<!--[endif]-->

六、結 論

總的來說，漢學和中國醫療史已建立起一種有利的關係。中國醫學史研究領域正在不斷拓展，而它的發展潛力亦被越來越多的年青漢學學者認同。中國醫學史研究有雙重的成果。它不但推動漢學研究，同時強化其他的學科，甚至影響醫療政策，以至鼓勵西方人認真地接受中國醫學的理論和應用。這多方面的影響可以進一步推動這學科的發展，最終會產生一個有助研究的制度。

<!--[if !supportFootnotes]-->

<!--[endif]-->

<!--[if !supportFootnotes]--> [1]<!--[endif]--> Franz Hübotter, *Die Chinesische Medizin zu Beginn des XX. Jahrhunderts und ihr historischer Entwicklungsgang* (Leipzig: Verlag der "Asia Major", 1929).

<!--[if !supportFootnotes]--> [2]<!--[endif]--> Franz Hübotter, *Beiträge zur Kenntnis der chinesischen sowie der tibetisch-mongolischen Pharmakologie* (Berline/Vienna, 1913).

<!--[if !supportFootnotes]--> [3]<!--[endif]--> Franz Hübotter, *Berühmte chinesische Aerzte des Altertums. 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Medizin* 7 (1914): 155-128.

<!--[if !supportFootnotes]--> [4]<!--[endif]--> Franz Hübotter, *Shou-shi-pien, ein chinesisches Lehrbuch der Geburtshilfe* (Berlin/Vienna, 1913).

<!--[if !supportFootnotes]--> [5]<!--[endif]--> Franz Hübotter, Kumamoto, 1924.

<!--[if !supportFootnotes]--> [6]<!--[endif]--> K. Chimin Wong and Wu Lien-Teh,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ng a Chronicle of Medical Happenings in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Period*, reprint edition (Taipei: 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 1985).

<!--[if !supportFootnotes]--> [7]<!--[endif]--> Ibid., vii. Georges Soulie de Mornat, a contemporary of Wong and Wu and, fluent in Chinese and having studied Chinese medicine in China for many years, an advocate of Chinese acupuncture in its own right, criticize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by K.C. Wong and Wu Lien-teh, as "actually a history of European medicine in China. The authors, who studies in English colleges in Hong Kong, have studied neither Chinese literature nor language." Paul Zmiewski, ed., *George Soulié de Morant, Chinese Acupuncture (L'Acupuncture Chinoise)*, trans. L. Grinnel, C. Jeanmougin, M. Leveque (Brookline, MA: Paradigm Publications, 1994).

<!--[if !supportFootnotes]--> [8]<!--[endif]--> Willy Hartner, *Heikunde im alten China. Sinica* XVI (1941): 217-265, and XVII (1942): 27-89.

<!--[if !supportFootnotes]--> [9]<!--[endif]--> Gottfried Schramm, *Schriftzeichenanalysen medizinischer Termini technici in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Leipzig: VEB Otto Harrassowitz, 1958).

<!--[if !supportFootnotes]--> [10]<!--[endif]--> Alfred Mosig and Gottfried Schramm, *Der Arzneipflanzen- und Drogenschatz Chinas und die Bedeutung des Pen-ts'ao kang-mu als Standardwerk der chinesischen Materia Medica* (Berlin: VEB Verlag Volk und Gesundheit, 1955).

<!--[if !supportFootnotes]--> [11]<!--[endif]--> Pierre Huard/ Ming Wong, *La Médecine Chinoise au Cours des Siècles* (Paris: Les Éditions Roger Dacosta, 1959).

<!--[if !supportFootnotes]--> [12]<!--[endif]--> Ibid., 6.

- <!--[if !supportFootnotes]--> [13]<!--[endif]--> Jutta Rall, *Die vier großen Medizinschulen der Mongolenzeit. Stand und Entwicklung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 in der Chin- und Yüan-Zeit*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70).
- <!--[if !supportFootnotes]--> [14]<!--[endif]--> Ulrike Unschuld, *Das T'ang-yeh pen-ts'ao und die Übertragung der klassischen chinesischen Medizintheorie auf die Praxis der Drogenkunde*.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Munich, 1972. See also, Ulrike Unschuld, "Traditional Chinese Pharmacology. An Analysis of its Development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Isis* 68 (1977): 224-248.
- <!--[if !supportFootnotes]--> [15]<!--[endif]--> Nigel Wiseman, 英漢 漢英 中醫詞典 *English-Chines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1995. Nigel Wiseman and Feng Ye, *A Pract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Medicine* (Brookline, MA: Paradigm Publications, 1998).
- <!--[if !supportFootnotes]--> [16]<!--[endif]--> Paul U. Unschuld, *Die Praxis des traditionellen chinesischen Heilsystems. Dargestellt an der heutigen Situation auf Taiwan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Pharmazie*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73).
- <!--[if !supportFootnotes]--> [17]<!--[endif]--> Paul U. Unschuld, *Pen-ts'ao. 2000 Jahre traditionelle pharmazeutische Literatur Chinas* (München: Heinz Moos Verlag, 19730; revised and enlarged English version: *Medicine in China. A History of Pharmaceu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if !supportFootnotes]--> [18]<!--[endif]--> The domain of prescription works has been neglected by sinologists almost entirely. A rare exception is Catherine Despeux' study of the "Canon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in Sun Simiao's 孫思邈 formulary *Qianjinfang* 千金方: *Prescriptions d'acupuncture valant mille onces d'or. Traité d'acupuncture de Sun Simiao du VIIIe siècle* (Paris: Guy Trédaniel, 1987).
- <!--[if !supportFootnotes]--> [19]<!--[endif]--> Georges Metailie, Des mots et des plantes dans le *Bencao gangmu* de Li Shizhen, *Extreme Orient* 10 (1988): 27-43. By the same author, "Histoire naturelle et humanisme en Chine et en Europe au XVIe siècle: Li Shizhen et Jacques Dalechamps," *Revue d'Histoire des Sciences* 42 (1989): 4, 353-374; "Botanical Terminology of Li Shizhen in *Bencao gangmu*," in *Essays on Science*, ed. M. Said (Karachi: Hamdard Foundation Press. 1990), 140-153. Georges Metailie and Elisabeth Hsu, "The *Bencao gangmu* (Classified Materia Medica) of Li Shizhen – An Innovation in Natural History?" in *Innovation, Convention and Controversy in Chinese Medicine. Festschrift in Memory of Lu Gwei-Djen*, ed. David Cullen and Elisabeth Hsu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if !supportFootnotes]--> [20]<!--[endif]--> Forthcoming.
- <!--[if !supportFootnotes]--> [21]<!--[endif]--> Forthcoming.
- <!--[if !supportFootnotes]--> [22]<!--[endif]--> Paul U. Unschuld, *Medizin und Ethik. Sozialkonflikte im China der Kaiserzeit*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75), English version: *Medical Ethics in Imperial China. A Study i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 <!--[if !supportFootnotes]--> [23]<!--[endif]--> Paul U. Unschuld, "Der chinesische Wanderarzt und seine Klientel im 19. Jahrhundert. Rekonstruktion eines Dialogs," in *Das andere China. Festschrift für Wolfgang Bauer zum 65. Geburtstag*, ed. Helwig Schmidt-Glintzer, Wolfenbütteler Forschungen, Vol. 62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95), 129-175.
- <!--[if !supportFootnotes]--> [24]<!--[endif]--> Catherine Despeux et Frédéric Obringer eds., *La Maladie Dans La Chine Médiéval. La toux* (Paris: L' Harmattan, 1997).
- <!--[if !supportFootnotes]--> [25]<!--[endif]--> Ibid., 20.
- <!--[if !supportFootnotes]--> [26]<!--[endif]--> Paul U. Unschuld, "Lepra in China," in *Aussatz Lepra Hansen-Krankheit. Ein Menschheitsproblem im Wandel*. Part II: Essays, ed. J.H. Wolf (Würzburg: Deutsches Aussätzigen Hilfswerk e. V., 1986), 163-183. English vers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Theory and Real Nosological Units. The Case of Hansen's Disease,"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17 (1985): 1, 5-8.
- <!--[if !supportFootnotes]--> [27]<!--[endif]--> Jürgen Kovacs and Paul U. Unschuld, *Essential Subtleties On The Silver Sea.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Yin-hai jing-we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 <!--[if !supportFootnotes]--> [28]<!--[endif]--> Paul U. Unschuld, *Medizin in China. Eine Ideengeschichte* (Munich: C. H. Beck Verlag, 1980), expanded and revised English version: *Medicine in*

- China: A History of Idea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 [\[29\]](#) Paul U. Unschuld, *The Chinese Medical Classics. Nan-ching. The Classic of Difficult Issues. With Twenty Commentaries by Chinese and Japanese Authors from the Third through the Twentie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30\]](#) Donald Harper, *Early Chinese Medical Literature*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7).
- [\[31\]](#) Craig Mitchell, Féng Yè, and Nigel Wiseman, *Shang Han Lun. On Cold Damage* (Brookline, MA: Paradigm Publications, 1999).
- [\[32\]](#) Paul Buell and Eugene N. Anderson, *A Soup for the Qan. Chinese Dietary Medicine of the Mongol Era as Seen in Hu Szu-Hui's Yin-Shan Cheng-Yao*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2000).
- [\[33\]](#) Ibid., XXX.
- [\[34\]](#) Brian E. McKnight, tr., *The Washing Away of Wrongs: Forensic Medicine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1).
- [\[35\]](#) Paul U. Unschuld, *Introductory Readings in Classical Chinese Medicine. Sixty Texts with Translation, Vocabulary, and A Guide to Research Aids*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8).
- [\[36\]](#) Xu Dachun, *Forgotten Traditions of Ancient Chinese Medicine. The I-hsüeh yüan liu lun of 1757*, ed. & trans. Paul U. Unschuld (Brookline, MA: Paradigm Publications, 1989).
- [\[37\]](#) Paul U. Unschuld, ed., *Approaches To Ancient Chinese Medicine. Proceedings of a Symposium on Terminologies and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9).
- [\[38\]](#) Wilt L. Idema, "Diseases and Doctors, Drugs and Cures: A Very Preliminary List of Passages of Medical Interest in a Numb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Novels and Related Plays," *Chinese Science II* (1977): 37-63.
- [\[39\]](#) Christopher Cullen, "Patients and Heal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Jinpingmei*," *History of Science* 31 (1993): 120-137. Daria Berg, *The Xingshi yinyuan zhuan: A Study of Utopia and the Perception of the World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ese Discourse*. 2000. Forthcoming. See also, Paul U. Unschuld, *Medicine in China. Historical Artifacts and Images* (Munich: Prestel, 2000), 107.
- [\[40\]](#) Robert P. Hymes, "Not Quite Gentlemen? Doctors in Song and Yuan," *Chinese Science* 8 (1987): 9-76.
- [\[41\]](#) Paul U. Unschuld, "Arzneimittelmisbrauch und heterodoxe Heiltätigkeit im China der Kaiserzeit. Ausgewählte Materialien zu Gesetzgebung und Rechtsprechung," *Sudhoffs Archiv* 61 (1977): 353-389.
- [\[42\]](#) As an interesting aside, the very first slapstick movie by a Chinese director, i.e., Zhang Shichuang's *A Laborer's Love* of 1922, provides evidence of an attitude towa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at was shar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by virtually all forces seeking to reform China to help it regain its former strength.
- [\[43\]](#) Paul U. Unschuld and Zheng Jinsheng, "Handschriften als Quellen chinesischer Medizingeschichte," *Monumenta Serica*, 2000, forthcoming.
- [\[44\]](#) See above note 23; also, Unschuld, *Medicine in China. Historical Artifacts and Images*, 75 ff.
- [\[45\]](#) Ibid., 54 ff.
- [\[46\]](#) Ibid., 56 ff., 142 ff.
-

從《明代華南農業地理研究》到《行會制度的近代命運》 ——浸大歷史系訪問學人新著兩種介紹

周佳榮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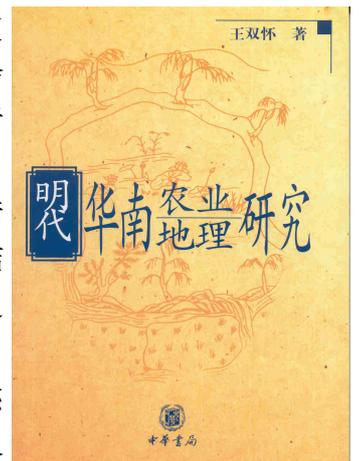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王雙懷教授和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的彭南生教授都曾經擔任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訪問學人，最近這兩位歷史學家分別有新著出版，以下作簡單的介紹。

（一）王雙懷著《明代華南農業地理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394頁）

本書是系統研究明代華南農業地理的專著，正如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教授的〈序〉所說：「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明代華南農業地理發展、演變的內在機制，為華南地區農業資源的開展提供了依據。」著者的〈前言〉亦指出：「明代華南農業地理原於歷史農業地理學的範疇，牽涉到許多學科領域。應當以歷史農業地理學的常規研究方法為主，借鑒歷史學、地理學、農史學等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做到文獻與考察相結合，宏觀與微觀相結合，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準備工作就緒之後，才開始對明代華南農業地理進行具體的研究。」

正文共分七章：（一）〈明代華南的農業環境〉分述行政建置、自然條件和社會風貌；（二）〈明代華南的人口資源〉闡明載籍戶口數據及其分佈、人口結構問題、兄弟民族及其與農業的關係；（三）〈明代華南的土地開發〉記敘土地開發的歷程、墾田面積的變化和耕地的主要類型；（四）〈明代華南的水利建設〉討論水利建設的發展、主要成就、地區差異和水利建設中存在的問題；（五）〈明代華南的糧食生產〉探究糧食作物的種類、主要糧食作物的地理分佈、耕作制度與糧食產量、糧食的主要產地等問題；（六）〈明代華南的副業經營〉介紹經濟作物的栽培、森林的開發與利用、畜牧業和水產業；（七）〈制約明代華南農業發展的因素〉分析自然災害的影響和內憂外患的干擾。

王雙懷教授的另一新著《唐代歷史文化論稿》（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3年），是他的唐史論文結集。王教授以歷史地理為基礎，對唐、明兩代史事多所注意，藉此擴寬其研究視野，是一大特色。



（二）彭南生著《行會制度的近代命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459頁）

本書是「普通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項目：近代同業公司研究與當代中國的行業協會規範」的階段性成果，正如蔡少卿的〈序〉所說：「本書主要探討了行會制度在近代的存



在與轉型及在政治、經濟、社會中的地位與作用。……一本書的另一個特色是將學徒制度從行會制度中抽離出來，進行了專門的探討。」

全書共有十三章，內容如下：（一）緒論；（二）會館、公所：舊式同業組織的延續與變遷；（三）近代工商同業組織的嬗變；（四）在近代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新式工商同業組織與近代經濟變遷；（五）在商亦言政：新式工商同業組織與民國政治；（六）近代工商社會中的同業公會；（七）學徒制度研究引論；（八）近代手工業學徒制度的重申與發展；（九）近代商業學徒制度的延續與變遷；（十）官辦手工業學徒制度的旋起施落；（十一）工廠學徒制的發展變化及其變異；（十二）近代學徒階層的分化與流動；（十三）近代學徒型企業家的崛起。

著者在資料運用上，選取以上海為代表的長江中、下游城市，原因是這些地區具有典型性，資料較為豐富，有大量一手資料如檔案、報紙、雜誌等，並參考了北京、天津、湖南的情況。順帶一提，此書是著者另一專書《中間經濟：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中國近代手工業（1840-1949年）》（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的深化和拓展，兩書不妨一併閱讀，互相比照。

王雙懷教授和彭南生教授先後於不同年度訪問浸大歷史系，其間與香港學者多所交流；去年又有中山大學歷史系趙立彬博士來系訪問，研究成果亦將發表。希望今後有更多內地學者來港訪問，增加兩地的學術聯繫。

【新書介紹】

香港出版史學書目提要

王雙懷著《唐代歷史文化論稿》，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3年。（451頁）ISBN 962-948-14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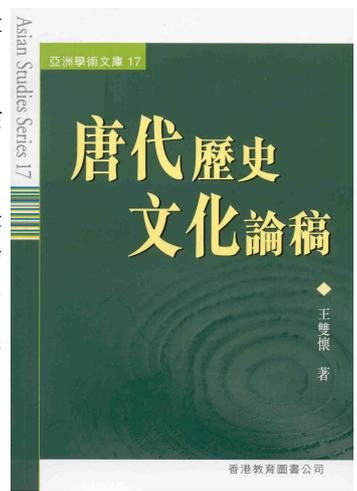
本書是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王雙懷博士研究唐代歷史文化的重要成果，共收論文十八篇，分為三部分：

上編「唐代政治史發微」論述政治史上的一些重大問題，包括〈「洺州降唐」事件真相〉、〈武則天與酷吏的關係〉、〈關於武則天的是非功過〉、〈再論郭子儀的歷史功績〉、〈唐代「和親」的歷史考察〉、〈唐都長安盛衰的前因後果〉六篇。

中編「唐代經濟史探索」從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等方面，系統論述武周時期和開元天寶時期的物質文明，共有論文六篇，依次為〈論武周時期的經濟形勢〉、〈論開元時期的經濟政策〉、〈開元時期農業的發展〉、〈盛唐手工業簡論〉、〈論盛唐時期的商業〉、〈論盛唐時期的水利建設〉。

下編「唐代文化史研究」集中探討文化問題，計有〈論唐代的飲茶風氣〉、〈唐代曲江風景區的演變〉、〈唐代帝王陵墓的基本結構〉、〈關中唐陵的石刻藝術〉、〈「唐陵之謎」新解〉、〈《臣軌》的作者、年代和價值〉六篇。

著者曾任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訪問學人，本書是他訪港期間的成果之一。總的來說，書中對武周政治、盛唐經濟、唐都長安、唐代帝陵的研究有較大突破，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武則天的本來面目，展示了不同凡響的盛唐氣象，闡明了長安城由盛變衰的前因後果，亦填補了唐代帝陵研究的空白。



何冠環著《北宋武將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03年。（590頁）ISBN 962-8820-7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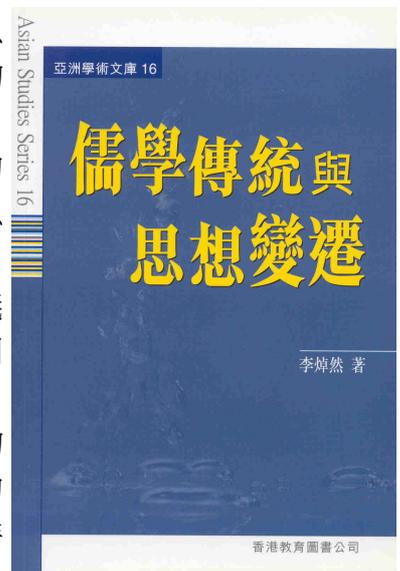


本書是香港理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高級講師何冠環博士十多年來研究北宋武將的論文結集，除陶晉生教授序和著者〈後記〉外，共收論文十二篇，頗有份量。前四篇屬通論性質，包括〈宋初三朝武將的量化分析——北宋統治階層的社會流動現象新探〉、〈論宋太祖朝武將之黨爭〉、〈宋太祖朝的外戚武將〉和〈論宋太宗朝武將之黨爭〉。其餘八篇是不同類型的北宋武將個案研究，計有〈論宋初功臣子弟馬知節〉、〈曹利用之死〉、〈敗軍之將劉平——兼論宋代的儒將〉、〈狄青麾下兩虎將——張玉與賈逵〉、〈北宋楊家將第三代傳人楊文廣事蹟新考〉、〈狄青故事的傳述者——狄家將第二代傳人狄詒與狄詠〉、〈《水滸傳》第一反派高俅事蹟新考〉、〈論靖康之難中的種師道與種師中〉。

著者以嶄新的角度重新審視北宋武將這一課題，從整體上探索北宋武將群體的狀況，例如他們在宋代社會流動的情形、武將之間的衝突和鬥爭等，進而採取微觀的角度加以考察。〈陶序〉亦指出，書中「討論黨爭、權力和人物的關係，發人深省。研究宋史的人必須細讀。……雖然是學術著作，卻也饒有趣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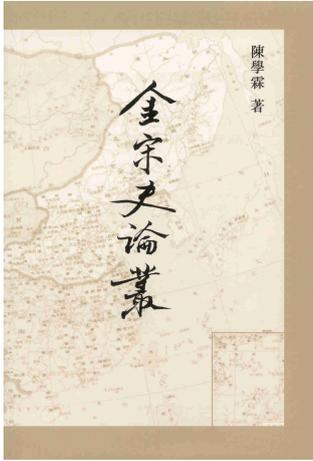
李焯然著《儒學傳統與思想變遷》，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3年。（256頁）ISBN 962-948-142-1

本書收錄作者近十年來有關儒學及思想史研究的專論十二篇，以「傳統」和「變遷」兩個觀念為核心，反映了傳統繼承和時代變遷的互動與衝突，以至儒學在近代政治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篇目如下：一、〈論儒家的經世之學〉；二、〈忠孝不兩全——儒家忠孝觀念的歷史考察〉；三、〈道德政治的因襲與革新——論范仲淹的經世思想〉；四、〈儒道與治道——唐太宗《帝範》與儒家的德治思想〉；五、〈《大學》與儒家的君主教育——論《大學衍義》及《大學衍義補》對《大學》的闡釋與發揮〉；六、〈明代國家理念的成立——明成祖與儒學〉；七、〈治國之道——明成祖及其《聖學心法》〉；八、〈王陽明《大學問》與儒家的「大人之學」〉；九、〈明中葉的反傳統思潮——吳中四才子與明代文人的自我追求〉；十、〈文明的接觸與協調——儒家思想與回教價值觀〉；十一、〈李焯然《明夷待訪錄糾謬》初探〉；十二、〈文化回歸——論章太炎對儒學態度的改變〉。



李焯然博士畢業於香港大學中文系，其後赴澳洲國立大學深造，師從柳存仁教授，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系主任。柳存仁教授在此書〈序〉中指出：「焯然的研究思想史，是從史家的基礎出發的，所以讀他的文字令我們會覺得和那些僅從理學（哲學）入手的研究文章不一樣，因為它比許多著作有較廣闊的視野和深入的關懷。」

陳學霖著《金宋史論叢》，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276頁）ISBN 962-996-097-4



本書是作者歷年探索女真金國及南宋王朝史事的論文結集，內容偏重金朝的政治經濟、軍事制度、人物、史學，以及宋金關係，共收論文十篇：一、〈「大金」國號之起源及其釋義〉；二、〈金朝的旱災、祈雨、與政治文化〉；三、〈金宋茶葉貿易考略〉；四、〈金代「射糧軍」考釋〉；五、〈「水寇」抑「義軍」？——南宋初邵青考述〉；六、〈趙彥衛《雲麓漫鈔》之宋金史料〉；七、〈金季循吏王元德基誌銘考釋〉；八、〈樓鑰使金所見之華北城鎮——〈北行日錄〉史料舉隅〉；九、〈元好問《壬辰雜編》與《金史》〉；十、〈劉祁《歸潛志》與《金史》〉。

陳學霖教授專攻宋金元明史，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系主任。此書各篇皆廣博採訪，鉤稽記載，以鑑別史料，考覈史實為基礎，尋溯個別的真象，探討其歷史意義，對宋金對峙的時代有開創性和深入的研究。書末附錄〈陳學霖英文金史著作目錄〉。

黎志剛著《中國近代的國家與市場》，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3年。（372頁）ISBN 962-948-08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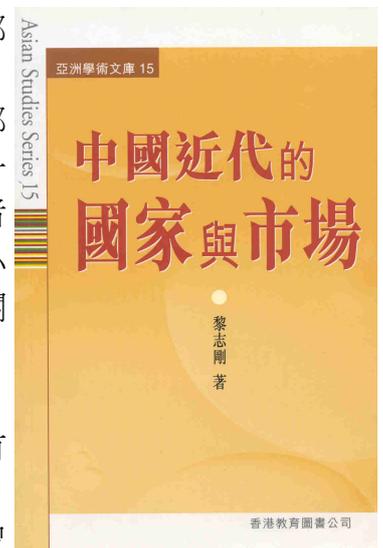
本書探討中國近代社會變遷中的國家、市場與企業關係，分為三部分：

（一）「物資文化和社會商業史」，包括〈近世中國商標與全國都市市場〉、〈中國近世的「品牌」和「商標」：資本主義出現之前的一種消費主義〉、〈想像與營造國族：近代中國的髮型問題〉三篇。作者應用物資文化（Material Culture）的研究方法，大量引用碑刻、筆記小說、圖刊、近人文集和檔案官書，探討宋代以來的市場結構、官商關係、網絡模式和消費文化的變動等課題。

（二）「近代新興企業的興起」，計有〈郭嵩燾的經世思想〉、〈李鴻章與近代企業：輪船招商局，1872-1885〉、〈輪船招商局國有問題，1878-1881〉、〈輪船招商局經營管理問題，1872-1901〉四篇。

（三）「商業網絡和中國近代企業的經營」，收錄〈香山商人的冒險傳統〉和〈近代廣東香山商人的商業網絡初探〉兩篇，前者討論中山地區商人的冒險進取精神和他們的經營手法，後者討論他們的地域分工和如何建成一個國際網絡。

著者黎志剛為香港新亞研究所碩士、美國加州大學博士，現任澳洲昆士蘭大學亞洲商業史中心主任。本書是他二十年來孜孜研撰的部份成果，何漢威在〈序言〉中指出予人印象最深的有兩方面：「首先是詳人所略，極具選題意識。……其次是取材周延豐富，甚至特殊獨到。」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武漢青少年書畫攝影展” “五一”再亮台灣

追憶偉人孫中山的思想是海峽兩岸的情結，更是兩岸同胞友誼和真愛的紐帶。原展期為20天的展覽，“五一”期間繼續展出，受到台灣青少年和民眾的關注和歡迎。

應台北“國父紀念館”張瑞濱館長的邀請，武漢國民政府舊址紀念館一行5人於3月27日至4月4日赴台舉辦“追尋偉人的足跡——青少年書畫攝影展”。由104幅（80*120CM）展版組成，其中圖表1幅，老照片20張，繪畫33張，攝影23張，書法29幅，新聞圖片56張。展期為20天。

3月28日上午9點半在“國父紀念館”舉辦了隆重的開幕式，兩館之間互贈禮品，台灣的湖北文獻社汪大華社長、辛亥武昌同志會的王家瑞、殷銑及其湖北藉的台灣同胞10餘人應邀出席了開幕式。自始至終充滿著熱情洋溢和睦友好賓至如歸的氣氛。

該展覽設在台北國父紀念館東展廳，展廳門口制作了一幅高6米，寬1.5米的紅底白字的布標“追尋偉人的足跡，青少年書畫攝影展”，格外醒目。整個展線約100餘米，展柜8個，展品精選6-16歲中、小學生書畫攝影作品，以建築為標誌，來表現對孫中山未盡事業的展望和繼續。展覽的陳列方案得到華師大嚴昌洪教授的指導審定：展品分三個部分：歷史偉業篇，選用孫先生足跡與舊址的老照片及攝影作品追憶孫先生1912年4月9日至12日親臨武漢三鎮進行考察、指導革命，著手擬搞《建國方略》的情景：遺願實現篇反映孫中山八十四年前有個武漢夢想，他計劃將武漢建設成為紐約、倫敦式的現代化大都市，由於武漢得天獨厚的區位和經濟優勢，早就引起先生重視，並設計了武漢經濟建設藍圖，今天武漢經濟文化建設基以他的設計實踐，已經初具規模。展品這部份從城市交通、整治長江、興辦實業、修建長江大橋、建設內河商埠等方面以建築標誌來展現，精選了部分學生的攝影、繪畫、及新聞圖片，尤其是龍王廟險點，先生在《建國方略》中曾二次提到具體改造意見，昔日險段今成景點。學生作品用攝影、繪畫形式反映了南岸咀、晴川橋、大橋、二橋的壯觀，達到極好效果。

第三部份繼往開來篇，展品主要是學生的書法、繪畫作品，大部份錄抄先生的題詞、贈言，傳承了先生三民主義和“自由、平等、博愛”思想，表現了海峽兩岸青少年對先生懷念、崇敬，並賦予了與時俱進的新內容。

展覽期間，觀眾絡繹不絕，讚不絕口，對書法、攝影、繪畫展品的作者出自6-16歲的大陸青少年之手筆，台灣的中、小學生在家長的陪同下利用周末時間來展廳參觀並臨摹。為期一個多月的展出，觀眾達萬餘人次。

（武漢國民政府舊址紀念館提供）

- 2003-2004年度幹事會名錄

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於2003年初選出新一屆的幹事會，名單如下：

會長：黃嫣梨博士（香港浸會大學）
副會長（外務）：蘇維初博士（香港公開大學）
副會長（內務）：葉漢明博士（香港中文大學）
秘書：黃文江博士（香港浸會大學）
學術：林啟彥博士（香港浸會大學）
財政：麥勁生博士（香港浸會大學）
總務：劉義章博士（香港浸會大學）

- 《香港中國近代史學報》創刊

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編印的《香港中國近代史學報》（*Hong Kong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第一期已於2003年6月出版，內容包括中、英文專題論文、書評等：

- 專題論文——

劉學照〈上海庚子時論中東南意識論述〉
黃嫣梨〈陳寅恪的治學精神——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家的典範〉
趙立彬〈正統之外：《知止軒隨錄》與李燮和辛亥革命史迹〉
李玉梅〈戰國策派（1940-1942）民族主義史觀〉
宏建桑〈五四時期周恩來民族思想之發展〉
Philip Yuen-sang Leung（梁元生），“Crisis Management in Late Qing China: Changing Roles of the Expectant Officials”
Wong Man Kong（黃文江），“The Changing Meanings of Governorship in Hong Kong between 1946 and 1997; with References to the China Factor in Hong Kong”

- 書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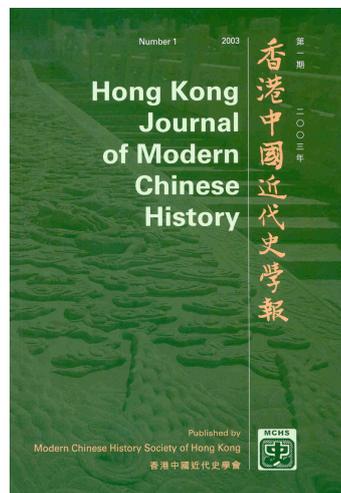
林啟彥：《民國文化》書評
張志東：家族戰略與市民：評關文斌《文明初曙——近代天津鹽商與社會》
歐陽志英：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

- 其他——

〈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沿革〉（本會幹事會）

- 〈編首語〉（梁元生）
- 〈顧問委員及編輯委員〉
- 〈2003-2004年度幹事會名單〉
- 〈本會會務及活動簡報（2001-2002）〉

（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提供）



《香港中國近代史學報》徵稿啟事

香港中國近代史會成立於1985年，一直以推動中國近代史之學術研究為本會的宗旨。《香港中國近代史學報》（*Hong Kong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前身為《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會刊》，為本會主辦之學術期刊，主要以中國近現代史之研究為範疇，登載世界各地學者之中英文論文及書評，每年一期，由本會負責編輯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承印及發行。新一期之《學報》業經面世。

《學報》編輯委員會歡迎各地學者賜稿，有興趣投稿人士請於2004年3月31日前，將稿件寄往香港新界荃灣德士古道郵箱528號《香港中國近代史學報》總編輯收。

來稿請附中英文姓名及工作機構名稱。論文可用中文或英文，連同註釋以2萬字、書評以3千字為限。請用電腦打字。以Word或PE II處理；註釋置於正文之後。來稿由編輯委員會以隱名方式送交兩位學者審閱，根據報告決定是否刊登。作者請自留底稿，來稿刊登與否概不退還。本學報不設稿酬，論文刊登後每位作者致送學報10冊，書評作者5冊。

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謹啟

【史學新聞】

香港近期展覽及講座

- 拿破崙大展

由香港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與法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合辦、香港歷史博物館與法國馮爾梅莊及普雷歐林堡博物館聯合籌劃的「拿破崙大展」，2003年4月30日至6月29日在香港歷史博物館專題展覽廳展出，回溯拿破崙一生的功業。展品二百件，包括波那巴特家族塑像、拿破崙的

隨身物品、歷史文獻和著名畫作，還有法國宮廷的名貴服飾和織品、珠寶首飾、書籍、傢具等，可以藉此欣賞到十八至十九世紀絢爛的法國文化。

- 少林寺文化珍粹大展

2003年5月6日至10日，中國嵩山少林寺一千五百年文化珍藏大展，在香港舉行。活動包括：

(一)《中國少林寺·建築卷》、《中國少林寺·塔林卷》、《中國少林寺·碑刻卷》「少林三大巨著首發式」，5月6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

(二)「少林文化國際研討會」，5月8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舉行。

(三)其他活動，還有大型表演晚宴、少林武術精華專場表演暨少林圖片展、文武匯聚耀東涌等。

- 吾土吾情——香江文化傳承

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公共圖書館合辦的「吾土吾情——香江文化傳承」展覽，由2003年5月18日至6月14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展覽館舉行，內容包括先民遺珍、民風物語、鄉邑拾遺三部分，展示了香港從遠古至近代的文化傳承及鄉村生活特色。

配合此項展覽，另於5月31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舉行座談會，由丁新豹博士（香港歷史博物館）主持，講者有：李金強博士（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鄧聰博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廖迪生博士（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 中國傳統建築講座系列

香港文化博物館於2003年7月至9月舉辦「徽州民居建築」展覽，同時舉行一系列中國傳統建築講座，包括：

「香港的民居傳統」（7月2日）

講者——狄麗玲博士、何志清先生、李浩然博士（香港大學建築系）

「香港歷史建築修復之簡介及經驗」（7月9日）

講者——林社鈴先生（建築署物業事務處高級物業事務經理）

「人文空間·居住環境」（7月16日）

講者——何培斌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建築系）

「香港傳統民居屋脊裝飾的文化」（8月13日）

講者——馬素梅女士（香港教育學院藝術系講師）

「從文化角度探討中國家具與建築的關係」（9月3日）

講者——羅啟研女士（設計師及《中國古典家具與生活環境》編輯）

《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即將出版

著名歷史學家、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二十世紀寫成的著成，匯編為《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由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預定於2003年8月31日正發行。全套共有十四卷，內容如下：

- 第一卷（史溯）——《古史系統神話傳說與比較左史學》（附：近東開闢史詩）
- 第二卷（甲骨學）——1.《甲骨集林》；2.《殷代貞卜人物》
- 第三卷（簡帛學）——1.《簡帛文藪》；2.《長沙楚帛書研究》；3.《睡地秦簡日書研究》；4.《敦煌簡編年考證》（李均明合著）；5.《新莽簡輯證》（李均明合著）
- 第四卷（經術、禮樂）——1.《經學昌言》；2.《古樂散論》
- 第五卷（宗教學）——1.《宗教新頁》；2.《道教探源》；3.《佛教淵源論》；4.《老子想爾校注》；5.《悉曇學緒論》
- 第六卷（楚辭）——1.《楚辭論叢》；2.《楚辭地理考》；3.《楚辭書錄》；4.《楚辭與詞曲音樂》
- 第七卷（史學）——1.《正統論》；2.《史學論叢》；3.《南方民族學論叢》；4.《九龍與宋季史料》
- 第八卷（中外關係）——1.《中外關係史論集》；2.《新加坡古事記》；3.《星馬華文碑刻繫年》
- 第九卷（敦煌學）——1.《法京所藏敦煌群書及書法題記》；2.《敦煌曲》；3.《敦煌曲續論》；4.《敦煌琵琶譜》；5.《敦煌學散論》；6.《敦煌白畫》
- 第十卷（潮學）——1.《廣濟橋志》；2.《潮州沿革志》；3.《潮州藝文志》；4.《潮汕地方史論集》；5.《薛中離年譜》；6.《郭之奇年譜》
- 第十一卷（目錄學）——1.《詞集考》；2.《遠東學院藏唐宋墓誌目》；3.《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善本目錄》
- 第十二卷（文學及詞學）——1.《文轍及續編》；2.《文選卮言》；3.《選堂賦話》；4.《詩學論集》；5.《詞學論集》
- 第十三卷（藝術）——1.《書學叢論》；2.《畫新編》；3.《黃公望及富春山居圖》；4.《八大山人畫說》；5.《選堂書畫題跋》；6.《虛白齋藏書畫解題》；7.《至樂樓藏明遺民書畫解題》；8.《供春壺考略》
- 第十四卷（詩文）——1.《選堂文集》；2.《選堂散文集》；3.《選堂賦錄》；4.《選堂詩詞集》

【史學新聞】

《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第四期簡介

香港浸大學歷史系出版的《近代中國基督教史集刊》第四期（2001年）已出版，本期內容如下：

- 專題論文——

邢福增（建道神學院）〈一九四九年前香港教會的發展——宏觀歷史考察（1842-1949）〉

李金強（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教會自立運動——以香港浸信教會為個案之研究〉

鄭振華（香港浸信會神學院）〈九七回歸與香港教會的社會角色〉

- 回應——

周惠賢（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九七回歸與香港教會的社會角色〉一文之回應〉

- 研究史——

黃元淵（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馬偕研究之述評與前瞻〉

- 教會史料——

徐有威（上海東華大學人文學院）〈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研究中值得注意之史料——洋票傳教士回憶錄概述〉

- 牧師傳——

張志偉（香港中央圖書館）〈王煜初牧師傳（1843-1903）〉

- 口述歷史——

湯泳詩（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崇真會——薛磐基長老〉

- 書評——

Yip Ka-c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 "Review of *The Sino-American Friendship as Tradition and Challenge: Dr. Ailie Gale in China, 1909-1950*, by M. Cristina Zaccarini"

R. G. Tiedemann (Department of History,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Review of E. C. Bridgman (1801-1861), *America'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 by Michael C. Lazich"
周啟榮（美國伊利諾大學）〈評蘇精著《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主辦單位：香港歷史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
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

Jointly organized by: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Modern History Research Centre of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ociety of Hong Kong

當代史學



第 6 卷第 2 期

2003 年 9 月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Review

Vol. 6 No.2

September 2003

22

網址 Web Site: <http://www.hkbu.edu.hk/~sosc1/hist/index.html>

香港 · Hong Kong

編印：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
近代史研究中心

地址：香港九龍塘

電話：(852) 3411 7107

傳真：(852) 3411 7885

電郵：hist@hkbu.edu.hk

Compiled and Published by
Modern History Research Centre
Department of Histor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Kowloon Tong, Hong Kong
Tel: (852) 3411 7107
Fax: (852) 3411 7885
E-mail: hist@hkbu.edu.hk

網址 / Web Site: <http://www.hkbu.edu.hk/~sosc1/hist/index.html>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轉載或節錄文章，須得作者書面同意。）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author.

本刊內的論著，乃表示作者的個人觀點或研究發現，並不一定代表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系方的意見。

The articles in this Journal record the personal views or research
findings of the contributors and do not necessarily express the official
views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非賣品 Not for sale】

